

世界历史与异化劳动

——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考

赵士发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都是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世界历史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异化劳动理论则从微观层面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实质上是劳动异化与异化劳动被扬弃的过程;而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劳动的转型,必然体现为共产主义的实践运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都是关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二者在政治哲学层面达到了逻辑上的交叉统一。

关键词 世界历史;异化劳动;政治哲学;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3)09-0043-06

长期以来,学界通常的观点是将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过渡性环节看待,认为马克思后来用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弃用了异化劳动概念,笔者以往也持这种观点^①。但在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非一种不成熟的思想,而是经过发展完善并成为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成熟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也只有从世界历史眼光去审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要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批判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危机,论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必然,因而都是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政治哲学与理论武器。虽然二者之间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性,但以往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重在提出问题,以供商榷。

一、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来说,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展开,它才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理论不仅是科学认识当代全球化实质与发展规律的有效理论武器,而且逐步把握到这一理论对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宏观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化时代认识与考察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历史眼光”。这种世界历史眼光,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世界眼光”或“历史眼光”。因为无论是世界眼光还是历史眼光,都将历史的空间整体性与时间整体性割裂开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是同一个过程,从而将历史主客体有机统一起来。因而,世界历史眼光强调的是世界历史时空的整体性与世界历史主客体的统一性,在方法论上坚持了

基金项目 本文为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士发(1973-),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参见赵士发《论异化与发展: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2期。

世界历史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和历史与价值的有机统一。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条件、过程与内在机制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观点,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东方社会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与历史进步的未来趋势是共产主义的实现等等。可以说,没有世界历史理论,以上这些观点就不可能形成。反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探讨,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与客观的经济条件出发,在理论上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实现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创立自己独特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就不难得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与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世界历史眼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视野。正是从世界历史眼光出发,马克思从宏观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1859年1月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这里,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总结了世界历史上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形态及其演进。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这里谈论的是世界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不是各民族历史的具体发展道路。如果联系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与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不难发现,世界历史眼光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创立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虽然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正式发表之前,卢卡奇就根据《资本论》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率先研究了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与物化理论,但直到《44年手稿》发表后,学界才普遍关注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应当承认,这一理论在《44年手稿》中虽然得到了集中表述,但的确还受到黑格尔思辨方法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马克思对劳动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认识都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并将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他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四个层面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内容与结果,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但他还没有对劳动本身的历史发展进行科学的考察,仅将异化劳动的条件笼统地归结为私有财产,对异化劳动产生的条件还没有科学的把握。因此,有人说这部手稿及其中的思想都是过渡性的,这并没有错。但如果进而认为这部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此中断,马克思再也没有使用“异化”这一概念则显得十分武断。因为在后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异化劳动理论,相反,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微观机制出发,考察了异化劳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使这一理论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法论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依然使用着异化和异化劳动的概念,并将异化与异化劳动置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在《57年手稿》中,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一道发展起来。”^②这里,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微观机制出发,考察了个人的发展如何从孤立发展到普遍异化,最后扬弃异化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其实就是人的异化状态。其历史条件是普遍交换的产生,即生产力发展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水平。于是可见,私有制只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经济加私有制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充要条件。如果联系后来马克思在《57年手稿》中对劳动形式发展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此时马克思已经对异化劳动的前提、条件有了科学的分析和把握。根据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我们不难把握到异化劳动的实质,就是指主体对象化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在市场经济条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4页。

件下反过来压制与束缚主体的过程和状态。

二、世界历史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性,它体现在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内在机理的分析把握上。马克思在《57 年手稿》、《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61 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从劳动的辩证发展出发,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微观机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①通过分析劳动辩证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揭示了个人的发展和解放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程度的内在一致性。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打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劳动不仅是人与人类社会产生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整个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无非是劳动发展的历史。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扬弃”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必然性,但当时的马克思还受黑格尔思辨哲学方法与费尔巴哈人本史观的影响,不可能科学揭示异化劳动的实质。经过十多年努力探索与不断的自我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获得了不断深化。在《57 年手稿》中,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通过对劳动形式从“特殊劳动——抽象劳动——自由劳动”发展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看来,特殊劳动是民族历史存在的实践基础。所谓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其根本特征是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这种受特殊规定性束缚的劳动是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无法超过劳动者自然需要的界限,从而生产劳动的范围以及劳动本身在质上都是非常狭隘的。在特殊劳动的形式下,劳动主要由特殊的原材料、特殊的工具或技能所规定,并与特殊的劳动者个人的规定性完全一致。因此,个人无法从一种劳动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便只能从事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的劳动。特殊的、狭隘的劳动形式决定了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狭隘。实际上,如果历史距今越久远,个人表现就愈加不独立,也就更加从属于整体。在奴隶制与农奴制条件下,劳动者不过是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的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②;在原始共同体中,虽然劳动者是所有者,但实际上劳动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共同体的财产而存在,个人只不过是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在自然的血缘依附关系的束缚下,个人只是狭隘的区域共同体的附属物。

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础,特殊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变即劳动异化的过程。所谓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其根本特征是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在《57 年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揭示了异化劳动形成的内在机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生异化的条件是:第一,劳动者同它的客观的现实的要素即劳动条件相分离;第二,物化劳动或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第三,货币所有者与劳动者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奴役关系为基础;第四,货币所有者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并且把价值增殖当作最终的目的^③。这些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逐渐成熟,结果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又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最终表现为交换和交换价值占支配地位。在此情况下,原先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抽象劳动因而成为普遍存在。

劳动形式从特殊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转变,一方面使劳动者个人摆脱了由于自然条件造成的原先狭隘的地域性关系的限制,在普遍交往中形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和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普遍的社会联系与全面的需要体系却成了独立于人以外的、支配和统治人们的异己力量。这决定了抽象劳动必将让位于更高形式的自由劳动。具体而言,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要求劳动者个人唯有生产交换价值才能存在,这就意味着对个人作为狭隘共同体附属物而存在的否定。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99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496页,第461页。

在《57年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①。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在更加普遍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中进行生产,才能打破过去不同地区、民族与国家间的自然束缚,拓展人们的交往空间与社会联系,建立起世界性的普遍联系。但是,由于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抽象劳动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物化,这使全面的需要体系成为独立于人们之外、支配与统治人们的异己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可见,异化劳动本身就是要被超越、被否定的历史性环节,它必将为新的自由劳动所取代。

正是通过对世界历史与异化劳动内在关系的这种考察,马克思厘清了异化劳动的前提是特殊劳动,这种特殊劳动并非什么抽象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不过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劳动。劳动主体与劳动客观条件是统一的,但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没有解除。与之不同,异化劳动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相对特殊劳动而言是一种抽象劳动。它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劳动主体与劳动客观条件发生了分离,人身依附关系解除了,但又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这样,异化劳动理论已经被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成为人们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三、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宏观分析与微观透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做出了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眼光出发,通过考察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自我否定的过程,阐明了资本主义既要开创世界历史又终将为世界历史扬弃的必然性,以及共产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必然性。

在宏观层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驱使生产超过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③在《57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自我否定的历程,从而在社会发展层面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

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无限地盲目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它既要肯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又要否定必要劳动时间。要解决这一矛盾,资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不断加大劳动总量,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与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即扩大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使它必然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的界限,从而开辟广阔的世界市场,用空间去换时间。二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采用机器生产与提高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主要是通过扩大发展机器体系,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用科学化的生产和管理,不断缩小必要劳动时间所占的比例,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但资本为解决矛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最终都必然会使资本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活劳动在生产中的比例日益降低,也就是说,直接劳动时间不断减少,这将导致交换价值生产这一资本生存基础的最终解体。“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巨大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④。另一方面,资本的内在矛盾必将为资本的自我否定创造条件。马克思曾分析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了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的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2页,第4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3-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17页。

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代替的人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①可见,资本扩大必要劳动最终会导致劳动成为普遍的需要,而社会的普遍勤劳所驱动的生产力发展,又将为社会及其成员创造出大量的自由时间。到那时,资本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决定了它在流通过程中依然逃脱不了自我否定的命运。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于,它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一方面,为了追求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占有,资本首先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与流通规模,以尽可能多地攫取绝对剩余价值。这里蕴藏着资本通过扩大流通领域而开创世界历史的秘密。“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②。流通的扩大必然会反过来导致生产的扩大,具体而言,就是资本生产的国际化。一旦生产向国际化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其他经济要素如资源配置、分工协作、贸易等的国际化,世界市场因而成为客观现实。其次,资本又要扩大消费范围,从质上扩大流通领域,以掠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对流通领域的扩大本身又是对其价值增殖的一种限制,因为单纯的流通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从总体上看,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占的比例越大,它在生产领域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流通过程既是资本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资本价值的丧失。所以,资本在尽可能扩大世界市场的同时,“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过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③。可见,在流通过程中,资本也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矛盾作用,最终必然导致自我否定。首先,资本在空间上不断扩大流通不是无限的。当资本在现实意义上占领并统治了全球,它在空间上的增殖就达到了极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求生产同时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了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外部要求”^④,从而资本走向了完全自我否定的道路。其次,资本在时间上缩短流通的努力同样会促使它自我否定。因为资本主要是通过信用制度来缩短流通时间的:一方面,这本身就是对资本所包含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否定;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资本的高度集中,并且终将拆解资本流通的基础。

资本生产是一个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资本的自我否定不仅是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自我否定,而且是资本在总的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否定。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基本矛盾,即无限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在《57年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系统动力。首先,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享受欲望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具体、有限的享受欲转变成为抽象、绝对的致富欲。资本就是在满足这种欲望的过程中不断增殖、不断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其次,资本的内在竞争本性,也是它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在资本竞争过程中,单个资本之间彼此施加压力,不断采取新的手段降低商品中的必要劳动量,使之小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从而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这种竞争压力正是资本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资本生产是以不断提高生产力为手段的,它包含着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但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于是“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⑤。具体来说,首先是资本为了自身的利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表现为各企业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有效性,但同时各企业却为自身的资本利润导致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是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形成矛盾,矛盾的激化便导致经济危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287页,第398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33页,第33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279页。

这个外壳容纳不了的时候,资本形式就会为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因此马克思讲:“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象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会作为桎梏被打碎。”^①那时,资本主义就将完成其世界历史使命,退出世界历史舞台。

从微观层面,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则从主体发展角度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私有制的异化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②在私有制下,历史主客体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成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私有制生活的异化,使历史主体变得愚蠢而片面,这都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必然导致的结果,因而扬弃私有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他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员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④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共产主义必然要消灭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不同于以往的一切革命,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⑤。这里的“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消灭异化劳动的前提是消灭异化劳动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在政治上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马克思指出:“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⑥这个过程,正是无产者个性的发展与解放的过程。

最后,马克思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由劳动与人的解放前景。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异化劳动的消灭过程,也就是新的自由劳动产生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⑦这里的“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而是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以产品经济和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通过自由劳动实现自己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正是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类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⑧

总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都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在政治哲学层面达到了逻辑上的交叉统一。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能忽视对二者政治哲学意蕴之发掘。

责任编辑:杨晓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68页。

②③④⑤⑥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89页,第197页,第539页,第543页,第573页,第185-1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35-436页。